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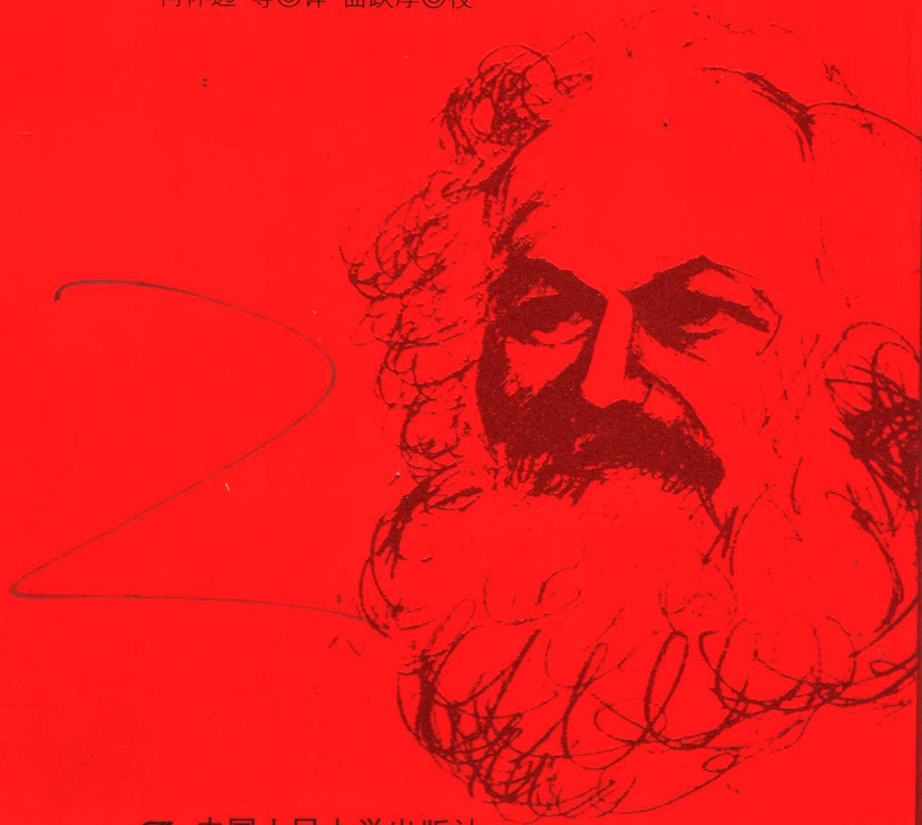


MAKING SENSE
OF MARX

理解马克思

[美]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著

何怀远 等◎译 曲跃厚◎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089.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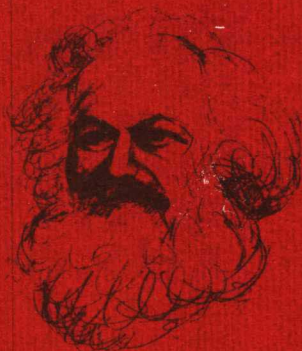
2008

MAKING SENSE
OF MARX

理解马克思

[美]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著

何怀远 等◎译 曲跃厚◎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马克思 / [美] 埃尔斯特著; 何怀远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8976-8

I. 理…

II. ①埃…②何…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720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理解马克思

[美] 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著

何怀远 等译

曲跃厚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33.2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74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

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

① [美]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写作历经时日，其中某些内容可能值得在此重新阐述。我在1968年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当时，我来到巴黎师从让·希波利特（Jean Hyppolite）。他早先曾对我撰写（关于黑格尔的）博士论文给以帮助，但他却在我拜见他的前一周去世了。那时，尽管我是一个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接受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外国留学生，但我在那些为该校奠定了基调的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并没有一种家园感。相反，由于加斯顿·费萨尔（Gaston Fessard）的介绍，我转向了同意担任我的论文导师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三年中，我经常参加他组织的研讨班（seminar），并受到了很大启迪。在我到达学校时，我并不知道有历史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感谢阿隆和他的研讨班的其他一些成员，尤其是科斯塔斯·帕帕约阿努（Kostas Papaioannou），使我学会了在一种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和历史问题的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与此同时，我还在随之而来的“资本论战”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我为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些严格的阐述而振奋，因而当其主要的用法被严格地用来证明它错了的时候又有点沮丧。

我在1971年完成了我的论文。虽然我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但当我发现我写的这种书不可能公开出版时便停止了这种努力。现在这本书的重点放在了理性选择理论、微观基础和解释哲学上。在当时的法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我的方法论承诺（commitments）自然会使读者将我置于政治权利之上。于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便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我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个有趣的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至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观点中对他们来说过多地残留的马

克思主义。所以，我离开了马克思，继而从事其他一些大多与我以前的工作完全无关的研究。随后十多年里，我完成了本书中被广泛引用的五部著作。《莱布尼茨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Leibniz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Capitaliste*, 1975) 是历史社会学中的一项研究，它试图根据当时正在进行的欧洲经济的变革来理解这位饱学之士的各种先见。《逻辑与社会》(*Logic and Society*, 1978) 把模态逻辑运用于社会学理论和问题，这有助于我在其他事物中抓住“社会矛盾”这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尤利西斯与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 1979) 和《酸葡萄》(*Sour Grapes*, 1983) 研究的是理性和非理性，主要的重点放在了偏好 (preference) 的形成和性格计划 (character planning) 的范围与限制上。《解释的技术变革》(*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1983) 是对解释哲学中的某些主题的一种揭示，包括对创新问题的一个个案研究。当我最终又回到马克思时，我发现，我极大地受益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论现在这本书的优劣如何，它也有着比 13 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好的基础。

我之所以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知识氛围正在发生变化。首先，G. A. 柯亨 (Cohen) 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的出版是一个意外 (revelation)，它突然改变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严谨和清晰的标准。我还发现，不同国家的同仁们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我们在 1979 年成立了一个小组并进行了会晤，以后每年会晤一次。这个小组中的历次讨论 (包括对本书草稿的广泛评论) 对本书的完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约翰·罗默 (John Roemer) 的贡献——这种贡献现在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中得到了深刻阐述——更是至关重要。这些讨论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我们觉得能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种意义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对他人说些什么，除非是说可能并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它在这些会议上并没有成为不断批判的对象)。但某种未曾表明的一致已经出现了，尽管我感到现在既不能诉诸它也不能解释它，或许，这种共识将明确地显现在本书忝列其中的该套丛书的其他著作中。

我希望感谢诸多给予我各种资助的机构和个人。1968 年到 1971 年，挪威人道主义研究会对我的马克思研究给予了慷慨资助；随后，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又再次予以资助。在关键的 1982 年，奥斯陆大学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All Soul's College) 激动人心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假期。

巴黎的人类科学院以多种方式（尤其是通过支持上述研究小组的会议）帮助过我。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我曾三次讲授本书的素材，他们尖锐的质疑迫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贯的帮助、耐心和鼓励。出于纯粹的友谊，斯蒂芬·霍尔迈斯（Stephen Holmes）先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全部手稿并删去了不当的格式。

柯亨先生阅读了所有章节的草稿，并做了详细评论（这对本书的全面修改是非常必要的）。我也通过和他的讨论学到了更多难以言表的东西，因为我确信，有许多我以为是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他。还有约翰·罗默，他的评论、他自己的著作和他在讨论中的贡献，也给了我诸多启发。他们的智力之谊乃是无价之宝。阿瑟·斯丁康姆（Arthur Stinchcombe）也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供了一剂社会学怀疑主义的良方。普拉纳·巴汉（Pranab Barha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伯纳德·查文斯（Bernard Chavance）、安纳德·海兰（Aanund Hylland）、利夫·约翰逊（Leif Johansen）、萨基·科尔姆（Serge Kolm）、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克劳斯·奥夫（Clause Offe）、冈纳·奥培德（Gunnar Opeide）、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朗恩·斯莱格塔斯基（Rune Slagstad）、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罗伯特·范·德·维恩（Robert van der Veen）、菲力普·范·帕里杰斯（Philippe van Parijs）、米彻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阅读了个别章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阅读本书时都发现了早期版本第四章中的一个错误——当时，我没有把瓦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当作一个篮球运动员。当然，张伯伦是一个打篮球的。他们还帮助我避免了许多更大的舛误。我谨对所有那些参与了这项几乎可以说是一项集体工作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尽管他们对尚存的某些错误承担了某种责任，但我必须对此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

乔恩·埃爾斯特

1984年1月于奥斯陆

目 录

前言和致谢	1
-------------	---

导 论

第 1 章 解释和辩证法	3
1.1 方法论个人主义	4
1.2 意向性解释	7
1.3 两种不同的因果分析	15
1.4 马克思当中的功能性解释	23
1.5 辩证法	31

第一部分 哲学和经济学

第 2 章 哲学人类学	50
2.1 人和自然	51
2.2 人性	57
2.3 社会关系	84
2.4 历史哲学	97
第 3 章 经济学	117
3.1 方法论	118
3.2 劳动价值论	124
3.3 积累和技术变化	135
3.4 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	145

第4章 剥削、自由和正义	162
4.1 剥削的本质和原因	162
4.2 自由、强制和被迫	194
4.3 剥削是非正义的吗?	205

第二部分 历史理论

第5章 生产方式	233
5.1 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	234
5.2 历史的生产方式	257
5.3 马克思的历史分期	282
第6章 阶级	304
6.1 定义阶级	305
6.2 阶级意识	325
6.3 阶级斗争	345
第7章 政治和国家	378
7.1 国家的性质及其解释	378
7.2 革命理论	404
7.3 共产主义	419
第8章 意识形态	436
8.1 问题的提出	437
8.2 机制	449
8.3 应用	464

结 论

第9章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	489
9.1 资本主义	489
9.2 共产主义	495
9.3 革命	501
参考文献	504
译后记	519

导 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卡尔·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第 1 章

解释和辩证法

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今天，马克思身上仍然有效的东西是他的方法，而非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命题。正如我将在以后各章中表明的那样，我不赞成这种观点。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剥削、阶级斗争和信仰形成的观点，仍有着超越了这种价值——它们可能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方法（如果有的话）的例证——的意义。但我相信，有一种特殊的、研究社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一种可以被广泛运用甚至能为那些不赞成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的人所运用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今天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致很少有人想起提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然而，历史地看，马克思是运用这种方法论的一个先驱。甚至在今天，他的全部洞见仍未曾枯竭。简言之，他强调了人的活动的非意向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即论证到，它们在因果性和意向性的框架中（这一框架已经成了社会科学的标准语言）得到了理解。显然，这种观念是和早先的各种把历史视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1]的理论相关的。但马克思对这种实际上已完全改变了的观点提供了一种特殊性和精确性，表明历史是可以理解而非不可理解的。的确，马克思也信奉和实践过其他一些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方法论观点，但我将论证到，这是微不足道的，或不是内在的旨趣。

在 1.1 中，我首先说明和证明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原则（马克思经常违背这一原则，但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大多数重要著作的基础）。这一原则的反面是方法论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它和黑格尔启示的两个其他方法——功能性解释（1.4）和辩证演绎（1.5.1）——密切相关。尽管在逻辑上并不相互承载（entailed），但这些方法在导致一种灾难性的科学实践中往往是相配的（go together）和相互强化的。在我看来，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失

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使人误入歧途的框架，因此，本书的许多篇幅将致力于表明强调马克思不求助于它而提出这些问题是如何可能的。

更特别的是，我将论证到，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允许更为精确和丰富的分析的框架。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科学解释被认为有三个层次：首先，存在着一种对精神状态（如欲望和信仰）的因果性解释（1.3.1）。其次，存在着一种对支撑着信仰和欲望的个人活动的意向性解释（1.2）。最后，存在着一种对个人活动融入了其中的聚合（aggregate）现象的因果性解释。最后一个层次乃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特贡献。我首先是把它作为因果分析的一种特殊模式来讨论的（1.3.2），然后再把它作为辩证推理的一种特殊形式来讨论（1.5.3）。

在本书中，我将反复回到这些方法论层次上来。本章的任务在于通过各种例证，相对来说有条不紊地阐明这种论证的抽象逻辑，后面各章则将对这两种既有局限又有合理之处的方法论立场进行阐述。在我看来，马克思何以能从几近胡说（near-nonsense）转向深刻的洞见（往往是在同一部著作中）是很不寻常的。例如，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关于方法论集体主义和辩证演绎之最为引人注目的论述，另一方面看到的又是运用 T. C. 谢林（Schelling）的用语对微观动机被聚合为宏观行为的那种方式之同样引人注目的分析。我坚信——它实际上是写作本书的全部事业的基础——马克思的主要洞见如此之有价值，以至于我们可能危害到他和我们（do him and us a disservice），如果我们接受那种它们借以嵌入其中的方法论的话。

1.1 方法论个人主义

我借此表明的是这样一种学说，即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是可以以各种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的。这样，方法论个人主义便被当作了还原论的一种形式。从各种社会建制与行为的聚合模式（aggregate patterns）到个人，从细胞到分子，都是同一种运作。还原论的基本原理可以简要地做如下表述：如果科学的目标是借助规律进行解释，那么就有必要在解释和被解释者之间——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尽可能地还原时间跨度（time-span），以避免各种虚假解释。这种虚假解释是通过混淆解释和相关性（correlation）以及混淆解释和必然性（necessitation）这两种主要方式产生的。第一种情况出现在有一个第三变量

(它是由明显的原因及其明显的结果引起的)的时候,第二种情况出现在结果由某种其他原因——它先占(preempts)了在规律中被引证的原因的运作——引起的时候。这两种风险只有在我们诉诸一种连续的因果链的理念时,即在我们减少解释和被解释者之间的时间间隔(time-lag)时才会降低。^[2]再者,这是和从现象的聚合到不甚聚合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这种观点中,还原论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另一个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desideratum)的伴随物。但我们应该说明的是,一种更为详尽的解释也是目的本身,它不只是我们在解释中的信心,而且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它在我们从宏观到微观、从较长的时间间隔到较短的时间间隔中得到了强化)。进行解释就是提供一个机制,即打开一个黑箱并显示那些引起了聚合这一结果的螺母和螺栓、嵌齿和齿轮、欲望和信心。“艺术和科学只能在高度组织化了的个人(particulars)中才存在。”^[3]

既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学说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颇有争议的学说(就像它以前在生物学中一样),那么某些解释还是恰当的。首先,这一学说既没有个人活动的层面上预设自私自利,甚至也没有预设合理性。正如1.2.1中论证的那样,尽管有一种赞同个人行为的这些特征的假定,但它纯粹是基于方法论的考虑,而非任何一种关于人性的实质性假定。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抑制的只是各种扩展性的关系(extensional contexts)。当聚合性实体出现在各种意向性关系中的时候,它们不能还原为低级实体。人们往往具有各种关于超个人实体(它们不能还原为关于个人的信念)的信念。“资本家害怕工人阶级”不能被还原为关于资本家对个别工人的感情的命题,而“资本家的利益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威胁”则可以被还原为关于个别工人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的复杂命题。再次,个人的许多性质(如“强权”)乃是内在相关的,因而对一个个人的准确描述可能涉及其他人。这一点在2.3.1中得到了详尽阐述。最后,还原的这种可欲求性(desirability)不应使我们对早熟的还原论的各种危险视而不见。帕斯卡尔(Pascal)批评了笛卡儿(Descartes)屈从于机械论生物学的诱惑,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现实的危险,即试图根据个人的动机和信念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可能导致各种贫乏的和武断的解释。在6.2中我论证到,这可能是对为集体活动寻找微观基础这个问题的一种证明。在这种证明中,我们最好不用黑箱来解释时间的存在。方法论集体主义绝不可能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它只是一种暂时的需要。

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目的本身——假定,在解释的次序中,存在着各种先于个人的超个体的实体。解释始于自我调节的规律或这些较大

实体的发展规律，而个人的活动则源于聚合的模式。这种解释经常采取功能性解释的形式，如果人们论证到客观利益为产生它们的集体活动提供了一种充分解释的话。然而，并不存在一种逻辑关联，因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也可能和一种因果解释模式相结合。相反，功能性解释可以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相一致，如果一个人坚持某种彻底的机械论的必然存在的话。^[4]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两种倾向是一致的，正如本书通篇将要表明的那样。

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2.4），人类显现为一个生来致力于充分认识历史过程的集体主体。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中，《资本论》起着一种类似的作用。对“资本一般”的解释作用的强调尤为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5]但有人——例如里卡多（Ricardo）——则相信竞争的概念先于资本的概念。相反，马克思断言：



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就象罗马的皇帝专制政体是自由的罗马“私法”的前提一样。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6]

人们可能并不希望更明确地否定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可以和约翰·罗默所倡导和实践的研究方法相对比，他认为，阶级关系和资本关系产生于一种竞争背景中不同天赋（differently endowed）的人之间的交换。他的分析的细节将在后面第4章和第6章中提出。对这一步骤之全面有力的论证是，它允许人们表示为一些否则便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假设的定理。

另一方面，人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也曾（至少是间断地）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做过承诺。《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依赖于对历史的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反目的论的研究方法，正如2.4中将表明的那样。而且，人们可以引述